

语法化学说 (第二版)

(美)

鲍尔·J·霍伯尔
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

著

梁银峰 译

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

 復旦大學出版社

语法化学说 (第二版)

(美) 鲍尔·J·霍伯尔 著
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
梁银峰 译



西·方·语·言·学·经·典·教·材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化学说(第二版)/〔美〕鲍尔·J·霍伯尔,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著;梁银峰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8

书名原文: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dition

ISBN 978-7-309-06183-3

I. 语… II. ①鲍…②伊…③梁… III. 语法学-研究 IV. 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936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06-069号

语法化学说(第二版)

〔美〕鲍尔·J·霍伯尔 伊丽莎白·克劳丝·特拉格特 著 梁银峰 译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韩结根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浦东东北联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331千
版 次 2008年8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6 000

书 号 ISBN 978-7-309-06183-3/H·1233
定 价 28.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言

INTRODUCTION

梁银峰

本书译自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文学科教授 Paul J. Hopper 和斯坦福大学语言学系和英语系教授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合著的 *Grammaticalization* (第二版), 原书于 2003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书第一版于 1993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 西方语言学界涌现了大量关于语法化问题的争论, 这些争论进一步推动了语法化理论的发展。第二版据此对第一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大大丰富了第一版的内容, 主要表现在: 第 1 章增加了对语言演变方向性问题的讨论; 第 2 章补充了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西方语法化研究的概述; 第 3 章增加了对“谁是语言学习者”、“遗传天赋问题”、“创新和扩展”等问题的讨论; 第 5 章增加了关于语言形式在演变过程中使用频率的讨论; 第 7 章补充了一些复合句结构发展的例子(如阿卡底亚语的引用 say-结构), 另外还增加了关于两个连接从句是如何经过重新分析发展为单一从句的讨论; 第 8 章补充了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对语言演变研究和语法化研究的重要启示。在补充内容的同时, 第二版也删减了第一版中某些过时的分析和讨论, 这里就不详细指出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 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 语法化已经成为西方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此后不久, 我国语言学界也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介绍语法化理论的文章, 如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 年第 4 期), 孙朝奋《〈虚化论〉评介》(刊

《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4期),沈家煊《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刊《当代语言学》1998年第3期)等。最近的文章,如吴福祥《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当前课题》(《语言科学》2005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介绍了国外语法化研究的最新动向和进展情况。随着国外语法化理论的不断引进,我国语言学界,尤其是汉语学界也开始从语法化的视角研究汉语问题,语法化日渐成为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Hopper和Traugott两位教授合著的《语法化学说》一书写作的初衷就是向语言专业的学生介绍语法化的研究概况,我们希望该书的中文译本能够为国内语言专业的学生以及其他研究者提供学习和研究的便利。

本书共分九章。第1章是前言,第2章回顾语法化研究的历史,第3章到第8章是本书的主体,第9章是全书的结语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下面结合汉语的情况简介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1. 前言

本章首先对“语法化”这一概念作了明确的解释和定义,具体说来,它有两层含义:(Ⅰ)一种研究语言的词汇、结构和语法材料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它在特定语言和跨语言中进行历时和共时的研究;(Ⅱ)一个涉及语言演变的术语,通过这种演变,词汇项和结构进入某种语境以表示语法功能,一旦这些词汇项和结构发生了语法化,它们继续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一般所说的语法化是后一种含义。按本书的看法,语法化并不等同于语言演变,它排除了纯粹的语义演变和词序演变,尽管它们与语法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根据语法形式的独立性和自由度,本章1.2.1节把它们初步分为“语法词”、“派生形式”、“附着形式”、“屈折成分”四类,这四种形式构成一个连续体,其中一端形式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独立的词),另一端形式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附属于词干的词缀)。

本章1.2.2节还介绍了语法化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斜

坡”。“斜坡”是一个隐喻性概念,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连续体”:沿着一条想像的路线把形式排列起来,其中一端是一些较为完整的形式(词汇形式),相反的一端则是被挤压的和缩减的形式(语法形式)。这一概念具有跨语言的共性。目前大多数语言学家都同意人类语言中存在一个如下类型的“语法性斜坡”:

实义项 > 语法词 > 附着形式 > 屈折词缀

尽管对于某个具体语言形式来说,究竟把它置于斜坡中的哪个位置语言学家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对它在斜坡中的相对位置没有多少争议。汉语史演变的不少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共性,最典型的是表示动作完成或状态实现的体标记“了”和表示动作进行或状态持续的体标记“着”,历史上它们分别由表示“了结”意义的动词“了”(如梅祖麟 1981、1994、1999,曹广顺 1986、1995:16—25 页、2000,吴福祥 1998)和表示“附着、置放”意义的动词“著”虚化而来(如赵金铭 1979,梅祖麟 1988,曹广顺 1995:26 页),这两个动词虚化为体标记以后,在某些双音介词中它们进一步变为词汇层面的语素,前者如“除了”、“为了”,后者如“顺着”、“沿着”、“朝着”、“照着”等。“了”、“着”之所以没有发展成屈折词缀,原因很简单,因为汉语属于孤立语,不会发展出形态屈折成分。这样,上述语法化斜坡在汉语中的情形应该是:

实义项 > 语法词 / 附着词 > 词内语素

1.2.2 节提出了“标补词”的概念,这个词本质上是引导限定补足语从句的连接词,如英语中引导主语补足语从句或宾语补足语从句的 *that* 就是个标补词。本节以埃维语(一种西非语言)的 *bé* 为例,简述了它的语法化过程。*bé* 本来是个普通言说动词,当它跟在母句中另一个言说动词之后时,在语义上便成为赘余成分,言说义开始丧失,形态上也不能再携带时、体标记,于是逐渐虚化为引导命题宾语的标补词。下一阶段,它适用的语境扩大,除了跟在言说动词之后,也可以跟在认知动词和感知动词之后,这是一个语法功能泛化的过程。据刘丹青(2004)的研究,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道”也有类

似的功能。据他的考察,“道”可以和很多 V 结合,构成“V 道”,这个 V 除了是言说动词(如“念、问、叫、喊、骂、答、唱、叹、吆喝、批评”等),还可以是写作、思维义动词(如“写、记载、想、转念”等),“V 道”的后面一定要有一个补足语小句作为 V 的内容宾语。刘先生认为这个“道”已经丧失言说义,它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引导宾语小句,因此,它已经虚化成了标补词(他称作“标句词”)。不过“道”不像英语里的 that 那样适用的语境广泛,而且一般只能用在直接引语前,使用没有强制性。和间接引语相比,直接引语在话语结构中的独立性较强,它和前面主句的复合程度较弱,用本书第 7 章的话来说,直接引语和主句构成的只能算是主从结构,还没有发展成高度融合的嵌套型从属结构。这和“道”还没有语法化为纯粹的从句间连接标记是一致的。

本书 1.2.3 节提到,有些欧洲语言名词的有定性后缀是从指示代词变来的,如丹麦语 dreng-en“那个男孩”中的-en、hus-et“那所房子”中的-et,分别是通性名词和中性名词的有定、单数标记,它们来源于更早的后置指示代词。本书在后面的章节中也多次提到,指示代词变为定冠词是一条跨语言的共性。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演变,如“其”,在古汉语中它是个典型的指示代词,后来它的指别性减弱,有虚化的趋势。例如:

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世说新语·尤悔》)本,这里指农业或根基。末,这里指不重要的东西。

昔有二估客,共行商贾:一卖真金,其第二者卖兜罗绵。(《百喻经·估客偷金喻》)

其时道诚劝惠能往黄梅山礼拜五祖,惠能报云:“缘有老母家乏欠阙,如何抛母无人供给?”其道诚遂与惠能银一百两,以充老母衣粮,便令惠能往去礼拜五祖大师。(《祖堂集》卷二,惠能和尚)

第一例中,“本”、“末”都不是指具体事物,无须“其”来指别,因而“其”的指别性是很弱的。第二例中,“其”用在由序数词构成的名词性短

语(“第二者”)前,从语义上看,由于已经有序数词对后面的名词进行了限定,这个“其”虽然也处在定语的位置上,也无须再加以指别。第三例中,“其”用在指人的专有名词之前,根据指示代词的功能特点,指示代词不能用于唯一的所指对象,“其”在功能上似乎也是赘余成分。

明代白话小说中,近指代词“这”和远指代词“那”也见用于人名之前,失去了指别性。如:

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风调雨顺,放宽恩大赦天下。

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东京。这柳世权却和东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水浒传》第一回)

据方梅(2002)的调查,现代北京口语中,“这”和“那”不仅可以位于人名前,还可位于通指名词(如“外国人”)、光杆名词(如“人”)或相当于光杆名词的“的”字式(如“男的”)和非回指名词(如“肉”)之前,语义上已丧失了指别功能,语音上已经弱化,方梅据此认为“这”和“那”在北京口语中已经演变为定冠词。不过我们觉得把“这”“那”看作定冠词还有点勉强,毕竟口语中使用这两个指代词时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而典型的定冠词用在名词前具有强制性(如英语里的定冠词 the),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北京口语中的“这”、“那”以及汉语史上的“其”,看作具有定冠词功能的语用成分,它们还没有语法化为句法成分。

2. 语法化的历史

本章回顾了以往语法化研究中一些重要的语言学家的思想,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早期的语法化研究;(二)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语法化研究;(三)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趋势。在早期的语法化研究中,法国语言学家 Antoine Meillet 发表于1912年的一篇文章影响巨大,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语法化”一词,并认为新的语法形式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产生的:一是类推,二是语法化。不

过 Meillet 认为词序演变也属于语法化的范围,本书不同意这一看法。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的语法化研究中,比较有影响的语言学家是 Givón,他在 1971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今天的形态是昨天的句法。”1979 年他出版了《语法的理解》(*On Understanding grammar*)一书,该书把所有的语言现象都严格地置于“句法化”和“形态化”的框架之内,该书提出了一个典型的语法化路径:

话语 > 句法 > 形态 > 形态音位 > 零形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语法化研究在西方语言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语言学家非常多,诸如 Lehmann, Heine, Reh, Fleischman, Traugott, Sweetser, Claudi, Hünemeyer, Bybee 等人,他们从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不同的角度探讨语法形式的演变过程,探讨的内容主要包括:(a) 语法化的历时方法和共时方法是否存在矛盾?是否还需要新的方法?(b) 语法化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还是非连续的过程?(c) 语法化在多大程度上是话语语用力量的结果?(d) 当概念和形式参与语法化过程时,它们的选择有什么限制?(e) 刚产生的语法化什么时候可以辨认出来?(f) 语法化是一种单向性现象吗?(g) 语言中的什么现象不是语法化的实例?语法化研究的最新趋势是:语法化和重新分析的关系是什么?语法化的发生是否来自重新分析?语法化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开始的?语言演变和语言范畴产生的首要诱发因素是什么?此外,语法和会话惯用法之间的界限问题、话语标记的产生、敬语与“礼貌的语法化”等也是最近几年人们热烈讨论的主题。

3. 重新分析和类推

重新分析和类推是促使语法化发生的两种普遍的机制,能够造成不同的结果。具体来说,重新分析指的是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变化体现为构成成分、层次结构、范畴标注、语法关系和黏着性(指边界

类型)的变化,它在本质上涉及的是线性的、组合性的、经常是局部的重新组织和规则演变,在形式上可辨认的修饰关系被揭示出来之前,它是隐蔽的;类推指的是已经存在的结构对现存形式产生的吸引同化,即规则的泛化,它在本质上涉及的是聚合关系的组织、表层搭配和用法模式中的演变,类推使隐蔽的重新分析的演变成为明显的。重新分析和类推在语法化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前者创造出新的语法结构,后者则为这种演变的发生提供主要证据。

本章还讨论了重新分析和语法化的关系。一般来说,重新分析会导致语法化的发生,不过并非全是如此。例如,词语的复合经常涉及弱化和词/语素之间界限的重新分析,比如 *bo'sun*“水手长”来自 *boat*“小船”+*swain*“人”,*hussy*“贱妇”来自 *house*“房子”+*wife*“女人”,*sweetmeat*“甜食”来自 *sweet*“甜的”+*meat*“食物”。*Swain*, *wife*, *meat* 并没有被重新分析为语法语素,这种重新分析的结果应该是“词汇化”,而不是语法化(详见 3.4 节)。汉语的复合词也是这样,历史上它们很多是由短语固化而来的,由短语到单一的词,词与词之间的界限丧失了,这是重新分析的结果,其结果一般是产生复合实词,所以不存在语法化的问题。

4. 语用因素

重新分析和类推是语法化发生的机制,但却不是语法化发生的动因。本章指出,语法化(包括语言演变)的发生受到说话人-听话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诱发,听话人激发了说话人提供信息、甚至提供清楚信息的意图,听话人也会积极地推测说话人的意图。实际的言语交际过程常常包含两种类型的语用推理:转喻和隐喻。隐喻涉及用另外一种不在语境中存在的事物,来确切说明一种一般是更复杂或更抽象的事物,两个概念之间受到类推和象似关系的诱发;转喻涉及用另外一种在语境中存在的、即使只是隐藏的意义来确切说明一种意义,它在本质上是由于在语流中一个概念实体邻近另一个概念实体而产生的语义联想,这种语义联想实际上是会话含义的语义化,即重

新分析的过程。可以说,这两种语用推理是语法化发生的真正动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研究语法化的学者更多地关注隐喻推理在语法化中的作用,比如表示身体部位的词如何通过隐喻变为处所词,空间词如何通过隐喻变为时间词,又如情态动词如何通过隐喻从强制性意义发展出与可能性有关的意义(认识意义)。最近几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转喻在语法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因为很多来源于词汇项的语法项不是独立于语境而产生的,语法项的产生离不开它所在的高度具体而局部的语境。比如英语里的 go 由趋向动词语法化为表示将来时意义的助动词,如果它不与表示目的意义的小品词 to 邻接(即在 be going in order to V“为某事而正在去往某地”这样一个语境中),它就不可能发生语法化。关于转喻推理在语法化中的作用,本书 4.3.2 节通过若干实例作了充分的讨论,结论是:在语法化过程中,作为重新分析的转喻比作为类推的隐喻起到了更大的作用。这一结论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是:在分析汉语事实时,如果只是孤立地谈论某个词汇项或语法结构的演变,往往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也不能令人信服,只有联系它所在的语境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我们在这里绝没有忽视隐喻推理的重要性的意思)。

本章 4.5 节还谈到了语法化形式旧意义的“滞留”现象。当某个创新形式被言语社团普遍采纳之后,它一般会经历语义淡化、形态黏着和语音磨损,但它原来的一些词汇意义踪迹往往会黏附着它,它的词汇历史上的具体细节会反映到对它的语法分布的制约上,这种现象被称作“滞留”。本节举了西非加族语的一个例子。在加族语里,受格标记 kè 本是“拿”义动词,虚化为受格标记以后,它只能适用于受事宾语,不能适用于结果宾语或感事宾语等,这一句法制约与它的前身是一个义为“拿”的动词有关,它虚化为受格标记以后,本身仍滞留着原有的意义。汉语的“把”由“持”义动词虚化为处置介词以后,它受到的制约与加族语的 kè 非常类似:(i)“把”字句的谓语动词不能是“看见”、“听见”、“闻见”、“知道”、“发现”一类的感受动词,这是因为这类动词对宾语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很小,如“我们把蓝天看见

了”、“我把那个消息知道了”、“敌人把侦察员发现了”等都不能说。

(ii) “把”字句一般指的是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进行某种处置,动作发生以前不存在、动作发生以后才存在的事物不能成为把字的宾语,如“生了个孩子”、“盖了间屋子”、“织了件毛衣”等不能变换为把字句。

语用强化和语义淡化也是本章讨论的重要问题。在语法化过程中,某个语法形式较旧意义的丧失和较新意义的加强存在一定的平衡性,较旧意义一般是相对具体的,较新意义一般是相对抽象的,这种抽象性更多地体现在表示时间、角色、连接等语法意义上。关于这一点,下面“单向性假设”一章还要再作讨论。

5. 单向性假设

关于语法化单向性问题的讨论,在本书的5—7章全面展开。所谓单向性是指,某个词汇项或短语通过在某些受到高度制约的局部语境中的用法,被重新分析为具有了句法和形态功能。其演变模式是:

使用于特定语境中的词汇项 > 句法 > 形态

基本的假想是两个阶段A和B之间存在一种关系,这样A就发生于B之前,但反之则不行。这就是所谓的单向性。

非范畴化是单向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所谓非范畴化,主要是指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范畴中相对原型的成员在它们的分布、至少在它们的一种用法中变为不太原型的成员的趋势,这一演变趋势如果用一个范畴斜坡表示就是:

主要范畴(>中间范畴)>次要范畴

主要范畴包括名词和动词,其成员是相对开放的;次要范畴包括前置词、连词、助动词、代词和指示代词等,其成员是相对封闭的;中间范畴包括形容词和副词,可以证明它们来源于(分词性)动词和(处所、方式等)名词。

语法化的单向性是一个强有力的假设,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它已经成为争论的焦点。本书认为,语法化单向性的实例和演变证据存在压倒性的优势,并且在跨语言地反复发生,而那些被引证为单向性的反例是零星出现的,而且大多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例如,“类转”的演变经常被引证为语法化单向性的反例,如前置词 *up* 和 *-ism* 经过类转之后可以分别变为动词和名词,前者如 *up their fees* (“提高他们的收费”),后者如 *various isms of linguistics* (“语言学的各种流派”)。因为类转演变违反了“短语/词 > 非黏着因素 > 屈折成分”这一图式化斜坡,所以被反对语法化单向性假设的语言学家称之为“非语法化”。本书作者认为类转演变是瞬间完成的,带有个人言语的创新性,这种创新能否被言语社团所普遍接受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爱沙尼亚语强调小品词 *ep* 的产生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单向性反例:最初它是 *päalla* 的强调形式、即 *päalla-pä* 的附着形式,它和前面的主词保持元音和谐。后来,附着形式的元音丧失了,元音和谐规则不再适用了,于是这个强调形式变成了 *peallep*。强调形式 *peallep* 不再与原来的非强调形式 *päalla* 存在显性关系了,*peallep* 被重新分析为 *peal-ep*。最后 *-ep* 经过重新分析词汇化为独立的语法词。

汉语中是否也存在语法化单向性的反例呢?国内有些学者也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不过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语言现象来看,似乎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如有学者认为,中古汉语以后产生的表示类同的副词“也”是由上古汉语的句中语气词“也”经过重新分析演变而来的(参李宗江 1997)。这一演变模式显然违反了上述由实到虚的范畴性斜坡,这个结论正确与否我们姑且不论,单就其中的某些论述来看,似乎还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文中所举的一些两可分析的例子,在我们看来很多是没有歧义的。在论证方面也值得进一步商榷:(i) 上古汉语的“亦”同时用作类同副词和句中语气词,由于“亦”、“也”音近,所以“也”的副词用法是从句中语气词变来的,但类同副词“亦”是否从副词变来目前汉语学界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李文也坦承这一点),因此这一论证缺乏有效性。(ii) 上古文献中,某些“也”

字有时位于单音谓词之前(如“杨木之木与桃木之木也同”),中古时期的五言诗中,“也”字有时处于第二个字的位置(如“命也归自天”),按韵律和节拍的要求,这些“也”字要么应该与后面的成分连读(是副词),要么它的词性难以确定(语气词、副词两可)。我们认为,由于汉语的音节特点,在具体语境中韵律规则战胜句法规则是常有的事,但在一起连读的形式未必在句法上就有关系,韵律和节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也”字与后面成分的关系,改变它们的句法关系的条件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语法化的单向性一般指某一语言形式语义内容的泛化或淡化,但需注意的是这决不意味着语义内容的丧失,在语法化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因为在旧意义(一般是具体的)淡化的同时,又增加了新意义——语法意义,因此,本书又把这一过程叫做“语用强化”或“语用加强”(见4.5节和5.2节)。还需要指出一点,语用强化或者语法意义的增加有时会涉及说话人主观化(情态意义)的增强,这样看来,主观化一般也应该是单向性的,即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关于这一点,本书作者之一Traugott在其他文章中也曾多次提到过)。主观化的单向性会不会有反例呢?显然不能说绝对没有,不过但凡提出反例都应慎重。最近有学者指出,汉语的被字句在最初产生时(中古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不幸或不愉快”的语用色彩,但在宋代以后的文献中(直至现代),相当多的被字句并没有这种“不幸或不愉快”的语用色彩,可见被字句的主观性是越来越弱的(见吴福祥2005)。这种看法恐怕混淆了“被”字本身的语义色彩和“被”字句的主观性,本书5.2.2节指出,某一语法形式语法功能的泛化(适用范围越来越大)是语法化单向性的重要体现,汉语被字句的“不幸或不愉快”的语用色彩是“被”字带来的(这是由它的本义“蒙受”、“遭受”决定的),不是“被”字句带来的,汉语的被字句越来越摆脱“不幸或不愉快”语用色彩的制约,表明了它所适用的语境越来越广泛,这恰好证明了“被”字句演变的单向性,我们认为,这种句法格式的演变不涉及主观性弱化的问题。

参与单向性的某些过程,如“特化”、“分化”、“更新”也是本章谈

论的重要内容。以“分化”为例,当某个词汇形式发展出语法形式时,原来的词汇形式可能仍会作为自主成分保留下来,这就是语法化理论中常说的“分化”。如果用 A 表示原来的词汇形式,用 B 表示发展出来的语法形式,A 和 B 会按照各自的方式发展下去,两个形式有可能共存几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但需要指出的是,B 取代 A,或者说 A 的消亡在语法化过程中并非不可避免,因而关于语法演变的常见公式“ $A > A/B > B$ ”应该被修正为“ $A > B/A(> B)$ ”(见 5.4 节)。汉语史上的量词(即本书中所说的类别词)“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本来是个实义名词,早在甲骨文时代“人”就有虚化为量词的趋势,如“人十有六人”、“羌十人”之类的句子,但这种结构中的“人”带有明显的名词性质,还不是典型的量词。据范崇高(2003)、王绍新(2005)的考察研究,在南北朝至唐五代这段历史时期,“人”开始进入“数量名”结构,这说明量词“人”确实一度获得了典型量词的语法功能。不过典型量词“人”在汉语史上仅存在了一段时间,唐五代之后,由于其他表人量词的陆续产生(如“口、员、名、位”等),再加上“人”本来就是汉语中的基本词汇,在具体语境中同时兼具两种身份难免发生混淆,这样,量词“人”就逐渐消亡了,到了现代汉语,“人”只保留了名词用法(“数词+人”位于指人名词之后的用法不能看作典型的量词)。这样看来,有时不仅新形式 B 没有取代旧形式 A,反而是新旧两个形式经过竞争之后新形式 B 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只保留了旧形式 A,因而上述语法演变的公式“ $A > B/A(> B)$ ”还可以进一步修正为“ $A > B/A(> B/A)$ ”。

6. 从句内部的形态演变

这一章是对上一章内容的继续,仍然讨论从句内部演变的单向性,主要内容包括形态化问题、形态成分聚合体的发展、从句内部语法标记的发展和形态化的最终结果——丧失。下面重点介绍一下形态化问题。

形态化指的是以前的自主词发展为附着形式和屈折成分的过

程。在有长期书写历史文献可以利用的语言中,很多黏着语素都可以追溯到独立的词,如罗曼语族语言中的副词后缀-ment的前身是个自主词,即拉丁语的mente“头脑+夺格”,布里亚特蒙古语动词的人称-数后缀来源于独立的主格代词。黏着语素的来源应该在派生出它们的早期频繁使用的句法结构中去寻找,因为短语或句子的结构规则与词语内部的结构规则往往是相同的(我们认为汉语尤其如此),这就是Givón所说的“今天的形态就是昨天的句法”。这一观点可图示为如下的语法化斜坡:

特定句法环境中的词汇项 > 附着形式 > 词缀

语法化并不必然导致形态化,如英语的助动词虽然前附于动词,但至今也没有发展为动词词缀。汉语是孤立语,也不会发展出屈折词缀,但可以“凝固”为词内成分。在汉语史的发展中我们经常看到,由某种特定的词类,如名(代)词和动词,与某类特定的附着词,如前置介词和助动词,所构成的频繁使用的句法搭配,经常典型地发生词汇化,前者如“于是”、“因此”,后者如“可恶”、“可爱”等(董秀芳2002:262—267页)。不过,本书又指出,语素语序反映了形态化之前的语言语序只是一个大致倾向,但不是绝对的规律。如蒙古语某方言中名词第一人称单数属格后缀-m是从单数第一人称代词变来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古典蒙古语的语序就是“名词+领属形容词/领属代词”,事实上“名词+领属形容词/领属代词”和“领属形容词/领属代词+名词”两种语序都有,而且后一种语序占优势(见6.2.2节)。

在有词缀形态的语言中,语法形式的融合常常体现为词干与词缀的融合、主词与附着形式的融合。据Bybee所做的跨语言调查,语法成分的融合存在一个普遍模式:(a)与动词意义直接相关的意义成分比那些不存在直接关系的成分更容易发生融合或者黏着;(b)它们出现的次序在某种程度上同它们与动词的相关度有关;(c)在与动词相关的意义中,最概括的意义容易以屈折形式来表达。比如多数语言倾向于通过屈折形态来表达体、时和语气,因为它们的意义高度概括。在这三者中,体与动词最相关;时次之,因为它建立在情

景时间与另一时间的关系之上;语气与动词的关系在三者中最小,因为它表达的是讲话人对情景的观点。体现在语素语序上,就是“语气—时—体—动词”这样一个序列(在OV型语言中,是“动词—时—体—语气”次序)。因此,大多数语言中关于体的形态是最发达的,然后才是时和语气的形态。比如汉语虽然是非常缺乏形态的语言,但“了”、“着”、“过”却是汉语学界公认的体标记,时和语气范畴是通过词汇形式或短语等手段来表达的。

7. 跨从句的语法化

语法化的单向性不仅体现在从句内部的形态演变中,而且还体现在跨从句的演变中,即复合句的发展过程中。诚如本书7.1节所说:“如果将语法化的定义扩大到涵盖一切语法结构的演变及其动机,那么,正如Givón所指出的那样,从句组合过程显然确实属于语法化的范围。”根据本章的描述,从句组合的发展也存在一个从较多并列性发展到较少并列性的单向性假设:

并列结构 > 主从结构 > 从属结构

在这个从句组合斜坡中,两个从句之间的关系从左到右越来越紧密,即从属性和嵌套性越来越强。

7.5.3节以当代英语中“传信插入语”的产生为例,说明复合句经过重新分析变为单一从句的过程。作者引述了Thompson和Mulac的分析,在当代英语里,主语为第一或第二人称的命题态度动词,如think(想)、guess(猜)等,正在变为插入语。这两个动词本来是句子中的主要动词,后面引出一个命题宾语从句,但在某些语境中,它们变为用来限定某个断言的插入语,如Commander Dalglish writes poetry, I think. (“指挥官达格利什写诗,我认为”。)I think变为传信插入语以后,它的句法位置灵活了,而且在语音上不再重读;与之相应的是,Commander Dalglish writes poetry本来是宾语从句,属于边缘从句,现在反而成了核心从句,而I think本来是核心从